

拔除“硬钉子” 打造区域经济发展“软环境”

■ 梁启东 专家

区域经济发展中软环境建设是基础性工程。软环境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困扰多地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大题材。

在政策趋同、规划统筹的情况下,营商环境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没有好的环境,商招不来、资引不来,招来了也留不住。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实践证明,哪里软环境好,哪里就会形成强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就会形成优势明显的“洼地”效应,就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反之,软环境差,投资者就会望而却步,经济发展就会受影响。区域竞争力之争,实质就是营商环境之争。

什么是软环境?软环境是指相对于硬环境而言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政务、政策、法制、市场与人文等环境。

比如从企业视角而言,一个地区的诚信环境怎么样;从政府的视角而言,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服务环境怎么样;从社会的

视角而言,一个地区的居民素质、文明环境怎么样等。

把软环境作为振兴发展的突破口,应该说抓住了点子上。

进入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变革。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要素红利”让位给“创新红利”,“政策红利”让位给“制度红利”,因此要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生活秩序。在市场开发方面,更要在“负面清单”基础上与国际接轨,按国际规则办事,建立完善的规则体系和制约惩戒机制,造就良好的投资环境。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按规则办事或违反规则行事的现象比比皆是。政府职能与管理经济的方式与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要求还相距较远,政企、政事、政资、政社、政群不分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行政审批事项过多、审批程序繁杂、工作效率较低,恃权管理、随意干预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地区市场秩序混乱,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地区封锁的问题比较严重。

实践证明,经济生活缺失规则、违反规则会严重影响市场秩序,影响了地区的信誉和招商引资环境。软环境已经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命门”“要害”。

软环境建设,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但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是软环境建设的工作主角和责任主体。软环境是政策环境、作风环境、效率环境、服务环境、工作环境,本质上这些环境是地方政府效能的外在表现。软环境建设得好不好,说到底的是各级政府及其队伍认识没提高、服务到没到位的问题。改善软环境,就是改革政府运行机制,就是转变政府职能。

打蛇要打七寸。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公正文明执法、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为重点,以推动政务公开、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为保障,坚持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的方针,努力研究建立软环境建设工作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影响软环境建设的突出问题,在软环境建设中要拔出“硬钉子”、要剔除“主障碍”,抓住软环境建设中的

主要矛盾。

这其中,关键是用“三种清单”定好制度规矩。

权力清单要变小。一律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坚决消除各类隐性障碍和“潜规则”。

责任清单要变清。一个部门能办好的事,就没有必要交由两个部门办。

负面清单要变短。首先容许,但可以有例外,即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一律允许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凡是已向外资开放或承诺开放的领域,一律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影响民间资本公开进入和竞争的各种障碍,一律予以清除。重点就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做到行政审批事项少、审批时限短、审批程序规范、政府服务优。

好的软环境,不光是大企业有市场、有效益,更是小微企业有活路、有出路;好的软环境,不光是国有企业、政府办的企业发展得好,民营企业也应该能发展得好;好的软环境,不光是精英阶层能大展宏图,更应该是草根也能够实现梦想。

环保量化问责 应全面推行

■ 魏文彪 编辑

近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及六个配套方案发布。其中,六个配套方案创新性地提出“量化问责”措施,明确提出治污不达标最高可问责地市级市委书记。(9月2日《新京报》)

虽然已有政策规定,但当辖区内出现严重环保问题等情形时,要追究相关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又缺乏实施细则,部分规定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强。而像《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配套方案这样,提出“量化问责”概念,具体规定:未按要求完成交办问题整改的,发现2个、4个、6个问题的将分别问责副县(区)长、县(区)长、县(区)委书记;通过强化督查或巡查再发现有新问题的,发现5个、10个、15个问题的将分别问责副县(区)长、县(区)长、县(区)委书记;行政区域内被问责的县(区)达到2个、3个、4个的将分别问责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等,则令环保问责规定得到细化,增强了环保问责规定的可操作性。

在环保问责缺乏“量化标准”情形下,出现未按要求完成交办问题整改的,通过强化督查或巡查再发现有新问题等情形,虽然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及其领导干部可能会被问责,但是所在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却可能逃脱问责。而像《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配套方案这样提出“量化问责”措施,当相关地方出现未按要求完成交办问题整改的,通过强化督查或巡查再发现有新问题的等情形,只要达到了规定的问题数量标准,相关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被问责,就將是一种必然。

而在实施“量化问责”情形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要想不被问责,就只有大力抓好环保工作,避免出现规定的问题与情形。正如国家环保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所说,量化问责关注的重点是县区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落实情况,同时延伸到地市级党委政府及有关单位的落实情况,不允许应付,不允许懈怠,不允许不作为乱作为。“你不干活,可能就会摊上事情,只要你落实责任,就会被问责”。这样也就有利于促使相关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环保工作上积极作为,真正把责任落实到位,进而对环境保护工作起到有力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鉴于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及环保形势的严峻性,“量化问责”措施不应仅限于京津冀地区实行,而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经由确定环保问责的具体量化标准,通过对各地在环保工作上存在不作为、落实责任不力情形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实施问责,促使全国各地党政领导干部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经由切实履责、积极作为、严格执法,令各地环境得到更为切实的保护,尽早实现“蓝天白云”梦想。

银行卡不能成为金融诈骗的帮凶

■ 张全林 职员

8月29日,海关关员在对一名出境男子所携带的黑色双肩包进行X光机检查时,发现92张银行卡。这些银行卡分属近10家银行,20多人名下,而卡的新旧程度却高度相似。该男子交代,这些银行卡都是别人的,自己是为了到香港进行大批量代购,再雇“水客”走私入境,以此赚取非法利润。目前,该名男子涉非法持有他人银行账户(卡)被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查处。(9月5日《深圳晚报》)

金融诈骗防不胜防,久为公众诟病。许多网络诈骗、电信诈骗,都是基于银行卡这个媒介。如果市面上银行卡存量减少了,诈骗分子作案自然不方便。据银协2016年度《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蓝皮书》披露,2015年,我国银行卡累计发卡量达56.1亿张,累计活卡量为36.9亿张,也就是说,银行发出的卡有超过三成变成了废卡。这是银行过度营销造成的后果。银行为了销卡,通常会给员工分任务,或有精美的物件赠送,冲着礼品的不在少数。银行为什么这样下血本?说明银行卡制作成本很低,可以忽略不计;近六成的活卡,仅凭年费也可以大赚一把。

银行卡过多泛滥,银行得利,客户受害。据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相关负责人朱金昊称,在南京打击的60多起诈骗案件里,还没有发现一张银行卡是通过实名登记的,即银行卡的户主根本不是犯罪嫌疑人。银行为追逐利益,不管持卡人想干什么,只要办卡均能获取手续费、年费收入。由于银行有利可图,对银行卡过度发行不遗余力。从以往破获的金融诈骗案来看,能搜出成麻袋的银行卡。这么多的卡,主要是靠有偿使用别人的身份证才办出来的。

在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实人不实名”的银行卡被犯罪分子大量使用。一套包含身份证、手机卡、网银U盾等资料齐全的银行卡,在网上售卖价格达1500元以上。有专门的团伙收购各种卡证后,雇人到银行开卡转卖。办银行卡能成一项地下产业,足以说明银行卡办理的游戏规则出了问题。银行为提升银行卡发行业绩,也不管是否人证相符,见身份证就给办卡,这是导致银行卡大量流入社会的直接原因。

银行卡的便捷,并不意味着办卡可以不要门槛。如果不严格规范银行卡办理的游戏规则,银行卡发行量就会有增无减。因为,办卡的户主不用卡,用卡的主儿是为了犯罪方便;诈骗的欲望压不住,办卡的需求就不会降下来。在电子金融背景下,正因为资金流转快,更需要筑牢“防火墙”。把客户的安全置于首位,才是真正的以互联网思维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银行卡屡屡被用来犯罪,也是一个技术防范课题。银行理应在防范技术上多下点本钱,能够在鉴别持卡人身份上把住关口,如使用激光签名、增加指纹验证功能和个人身份识别代码等技术,准确认定持卡人是否是真正用户。还应该全面推广带有微电脑芯片的智能卡的使用,进而提高银行卡使用的安全程度。篱笆扎紧了,利用银行卡盗窃、诈骗之类的犯罪自然无计可施。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老百姓账户的资金和安全怎么保障,仍然是第一位的。让防骗跑到诈骗的前边,必须有效落实金融媒介监管实名制的要求,让客户资金安全切实套上“金钢罩”。

戏画闲言

认证中心也山寨

■ 吴之如·文并画

《中国青年报》报道,江苏英才职业技能鉴定有限责任公司打着“全国职业资格认证中心”的旗号,伪造职业资格,组织“职业资格认证”,向学生出具几可乱真的“职业资格证书”,并以个人和企业名义创建证书查询系统。人社部日前表示,对违法违规设置的职业资格事项,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

这个“英才公司”的头头们,称得上捞钱歪才了。敛财却不顾起码的法律法规和

社会公德,斗胆乱打“国字”虎皮旗号,大量抛售“职业资格证书”,甚至“山寨”了名号足以唬人的“认证中心”,以假乱真的功夫真是到家了。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再怎么包装打扮,驴粪蛋也成不了金疙瘩。对这一类伪劣把戏,人社部“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的态度,正是假货难碍人心、骗局不再时兴的证明。有道是:

“认证中心”也山寨,“资格证书”纯骗财;捞钱哪顾择手段,弄虚作假显奇才。

奇怪的是:“然而,时至今日,江苏英才公司依然在众多职业院校中组织职业资格



考试,发放违规职业资格证书,并向考生收取高额费用。”其背景到底有多强硬,靠山有多高大,难免令人生疑。难道法规在这儿就失效了,“查处”在此处就遁形了,“依法治国”的国策就隐退了?此事结局究竟如何,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5星级酒店不换床单 病根究竟在哪里

■ 王恩亮 职员

近日,网上热传一段某独立测评机构拍摄的小视频,其测试了北京地区5家知名5星级酒店,发现均未彻底清洁浴缸、马桶圈,部分酒店未更换床单、枕套,酒店的卫生情况引发关注。(9月5日《新京报》)

很难想象,作为5星级酒店,竟然在客人走后不换床单。若不是这家独立测评机构暗测出这一黑幕,相信很多人还对这类酒店的卫生状况持一百个放心。

那么档次超高、收费不菲的5星级酒店,为何能干出“野鸡”旅馆才能干的这等龌龊事,它的病根究竟在哪里?可以肯定地讲,没有一个5星级酒店会纵容自己的服务员这样做。毕竟客房服务员的责任,就是负责客房的卫生工作,包括按规定更换

床单,按标准清洁浴缸、马桶等。5星级酒店不可能花钱请她们来,让其去干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同时,5星级酒店永远是监管部门的重点监管对象,他们不可能冒着败坏名声和被罚款的风险,允许服务员这样胡来。

如此看来,问题显然出在客房服务员身上。既然导致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客房服务员,是不是就等于抓住了这一乱象的病根,接下来对她们进行问责和处理就行了?在笔者看来没那么简单。首先,客房服务员能够按规定换床单,说明该酒店的操作流程不够规范,把关不够严格。换句话说,如果按照操作流程来,起码会建立一客一换床单的台账,并始终让退房数量与退房中换床单量一致。当退房中的换床单量少于退房数量,不用说,肯定是客房服务

员偷懒了。此时如果有严格的把关跟进,客房服务员还能投机取巧成功?其次,客房服务员对客房公共用具清洁不彻底,说到底,要么是酒店对此没有建立监督验收机制,要么建立了监督验收机制却监督验收不到位。试想,如果该酒店对客房服务员的保洁通过制度进行约束,并实行专人跟踪监督和“一客一验收”,客房服务员还敢拿保洁不达标当儿戏?

总之,5星级酒店出现不更换床单现象,虽始作俑者是客房服务员,但病根却出在内部管理上。要想杜绝此类事情再此发生,必须通过制度建设,向操作流程要规范,向监督验收要达标,向惩戒措施要威严。唯有这样,才能让客房服务员不敢、不能和不想去偷懒,才能确保客房卫生安全。

“怒扔共享单车”倒逼监管跟进

■ 黄春景 职员

共享单车在全国各地都有点“泛滥成灾”的架势,反而给市民出行多少带来不便,不少城市也不得不暂停新车的投放。据澎湃新闻报道,9月2日在四川成都,就是因为太多共享单车挡住了公交车站,一名女子在一气之下,将多辆单车扔到了马路中央,造成交通堵塞。据目击者称,该女子还声称:“我不方便,都别方便了。”(9月5日《澎湃新闻》)

消息一出,舆论热议。在某些人看来,都说此女是“女流氓”“泼妇”“精神病”,我倒觉得她是一个有着“牺牲自我、方便大家”精神的“女侠”。她这么做虽然过激了,但结果是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有助于“倒逼”监管及时有效跟进。眼下,共享单车如蝗虫一

般泛滥,在城市里随便走走,很多人行道、地铁口等公共场所都堆满了共享单车,先不说市容面貌会否因此受影响,此举难免给行人带来这样那样的不便。

必须承认,共享单车出发点是解决绿色出行,方便百姓,其初衷是好的,但是现在未免太泛滥了,特别是公交车站边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几乎快要连人都走不过去了,这是为了方便吗?共享单车由于过度投放,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共资源,是时候合理控制一下了!笔者认为,应该对共享单车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和处罚制度,既然企业推出了服务产品且进行商业化运作,一旦监管跟不上,这与游摊小贩随意设摊摆点有啥区别。窃以为,共享单车不能打着“便民”旗号,去衍生另一种“不便”,如是这样也就与“共

享”“便民”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有报道说,武汉市9月4日起暂停投放共享单车,违者将被约谈或管控。其实,不仅仅是武汉,最近以来,郑州、广州、福州等多个城市也纷纷叫停共享单车再投放。原因是各企业无序竞争、过度投放及骑行者乱停乱放问题突出,给交通和市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不得不说,监管机制及行业标准落后于市场发展,是导致如今共享单车市场乱象丛生的根源所在。拿什么来管制共享单车,让其健康发展,考验着职能部门的善治智慧。

根治乱停乱放现象,只靠提高骑手素质仍然不够,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发展需要更多的政策兜底。只有制定出台统一严格的行业标准,配以规范高效的企业运营,市场才能有序发展,共享单车才能最大程度上被民众

使用。简言之,管理比投放更重要,对共享单车这一行业来说,并不是投放数量的比拼,而是能否运用智能化、精细化管理,使共享单车在便民的同时尽量少一些民愤,真正做到便民而不是扰民。

女子怒扔共享单车,仅靠素质说事也有失公允,这还拷问着监管是否及时到位,以及企业的责任,等等。由于过度投放,共享单车在方便市民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变成了“灾难”。共享单车“围城”引起众怒,女子怒扔共享单车只是个案而已,现实当中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现象发生。因此,对于女子“怒扔共享单车”,需要理性看待,不应动辄上纲上线,毕竟凡事都有多面性。从另一个角度看,女子“怒扔共享单车”若能促成监管的到位和管理的完善,这反倒是好事一桩呢。

情,花钱买放心。

百万钱财不算少,但算账笔也并不多。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2015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至76.34岁,比2010年提高了1.5岁。年均1万多的“饭票”,在中国人均GDP早已超过8000美元的今天,似乎也不算特别奢侈的事情。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高达134万,其中亿万富豪8.9万名。抛开不淡定的CPI不说,中产以上的阶层买个“百万饭票”也不算异想天开的事情。有需求,则有市场,生鲜配送承包一生的创意,也许算不得脑洞大开的“局”。

不过,这种“百万饭票”究竟是营销噱头还是新兴产业,答案还真真是不太好看。第一,

企业要对消费者“包养一生”,前提是自己要能“长命百岁”。如果生鲜配送做不成百年老字号,万一中途夭折或卷钱走人,这后半生的饭票找谁去兑现呢?至于商业保险,恐怕亦非兜底之计。因为保险公司很诚实地表示:保险公司和该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万一质量问题或破产,不是全部赔付,而是按该保险购买时确定的一定比例进行赔付,“但是公司跑路,或者他们经营问题,不归我们管。”可见,这个“百万饭票”的风险系数还不小。

第二,这种预付费的交易方式涉嫌违法违规。早在2012年,商务部就出台过《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对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单用途预付卡企业进行登记备案。《管理办法》第三

章发行与服务章节明确规定,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1000元。显然,这家公司即便是“最低档次的1.5万的会员卡”,也超出了5000元的标准。”此外,如此大额度的消费凭证,公司该在工商等职能部门预存多少保证金呢?

有人说,如此巨额的饭票,“办满10个会员大概就可以跑路了”;有人说,这个庞大的豪华市场是食药监等职能部门从牙缝里为它们挤出来的。这些话,当然都是玩笑。只是,“毒大慈”等事件一再说明:在分工精细、链条繁杂的食物链,已经没有能独善其身的“净土”了。企业能否百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餐桌安全还能澄净如初吗?